

華夏文化論壇

HUAXIAWENHUALUNTAN



吉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吉林大学东北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主办

第13辑
2015

吉林文史出版社

華夏文化論壇

HUAXIA WENHUA LUNTAN

吉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吉林大学东北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主办

第十三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夏文化论坛·第13辑 / 张福贵主编.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5.8

ISBN 978 - 7 - 5472 - 2883 - 8

I. ①华… II. ①张… III. ①文化史 - 中国 - 文集 IV. ①K20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97457 号

Huaxia Wenhua Luntan

书名 华夏文化论坛(第十三辑)

主编 张福贵

责任编辑 李延勇

封面设计 蔡雨

出版发行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网址 www.jlws.com.cn

印刷 吉林省金山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6 开

印张 16.5

字数 350 千

版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472 - 2883 - 8

定价 30.00 元

《华夏文化论坛》



学术委员会（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兆鹏 刘中树
朱泓 许结
李守奎 李壮鹰
李学勤 张法
吴振武 孙长智
林沄 陈平原
陈炎 莫砺锋
程妮娜 霍志刚

主编 张福贵

副主编 张锡坤 徐正考
李海帆

编辑部主任 张丛皞

执行编辑 李海帆 张丛皞
张斯琦

目 录

名家讲坛

消费时代的意识形态冲突

——以韩寒现象为例	肖 鹰	3
晚明社会转型的历史思考	商 传	9
东亚文化经验:韩中文化文学互动百年	朴宰雨	18

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研究

兰台及其与东汉前期文学	李德辉	29
一滴雨的诗性思维	田子馥	39
宋元南戏“明改本”对“前文本”的会通	罗冠华	43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鲁迅与顾颉刚(一)	王富仁	55
论长篇小说《山川记》和《盐道》	李继凯	80
《头发的故事》的话语及语用修辞	许祖华	87
乡村伦理与乡土小说:影响与互动	贺仲明	96
中外诗律比较的学理分析	王天红	105

汉语言文字研究

清末民初四部西方传教士编撰的厦门方言字典音系比较研究 …… 马重奇 马睿颖	117
《颜氏家训》用语与颜师古《汉书注》互证举隅	
——以《颜氏家训》的《勉学》《书证》篇为中心 …… 赵睿才 张忠纲	132
“国别化”汉语教材编写的几点思考 …… 禹 平 王宏蕊	139
从孔子学院教师的角度看汉语教学与中国文化传播的密切关系 ……	
…… 徐英春 李冬梅	143
韩国留学生汉语非完整体习得过程中的母语负迁移研究 …… 屈 菲 李 春	148

文化传播研究

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逢增玉	157
中国佛教本土化进程中的传播之道 …… 苏克军 王国庆	161
多重学术背景下的视域融通	
——评孔朝蓬教授专著《光影变幻——影视文化传播现象研究》 ……	
…… 战 迪 张耀元	167
媒介与权力	
——文化传播视域下的《自由中国》杂志及其文艺栏研究考辨 …… 许文畅	172

台湾学术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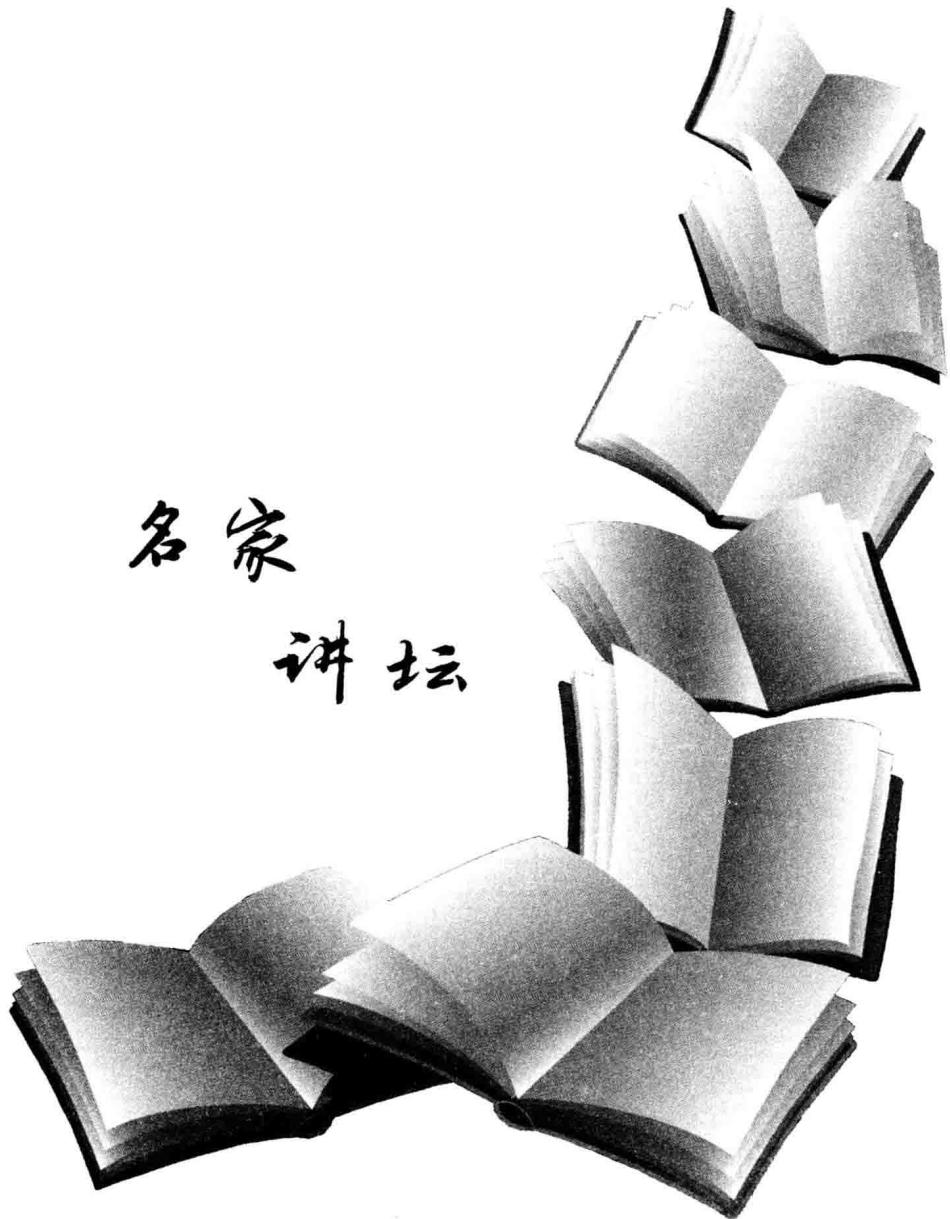
民国文学边缘作家群体研究的文学史意义 …… 张堂锜	181
性控诉、解放与反思	
——两岸八九十年代情欲题材小说的兴起 …… 林素卉	191
“观自在”的边缘人	
——重读《棋王》 …… 张克济	199

王小波《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的叙事视角	梁雅英	205
多多的诗:否定精神的内在转化.....	聂 豪	214
从张抗抗《请带我走》看知青文学的创新	冯羽涵	224

青年学者论坛

论现代汉语小说中的春节描写	肖易寒 李继凯	235
诗歌语言的延展与抬升 ——读王家新译诗集《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	马海波	249

名家
讲坛



消费时代的意识形态冲突

——以韩寒现象为例

肖 鹰

【作者简介】肖鹰，男，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研究员。本文根据肖鹰先生 2014 年 9 月 19 日在吉林大学的演讲整理而成（北京 100084）。

今天晚上非常高兴来给大家做一个以消费时代的意识形态冲突为主题的报告。谢谢大家！

关于消费时代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也是我们当下文化面对的一个基本的社会语境。消费时代对于我们中国来说，是和计划经济时代相对的，计划经济时代一切都是按照社会统一规划、统一分配的原则来进行生产和消费的，那么消费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以自由市场为基本的运转机制，来展开生产和消费的。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对消费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就是节约。比如大家都知道的雷锋叔叔，雷锋叔叔有两个重要的品质，一个是助人为乐，还有一个就是厉行节约。毛主席也早就说过，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那么，我们在消费时代的另外一个政策需要，就是要以拉动内需来提高我们的经济，推动我们经济的发展。所以消费时代是一个鼓励消费的时代，是消费自由、消费光荣，在某种意义上说不消费是可耻的。

2014 年 8 月 19 日我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可能是那一周在中国最受关注的一篇文章，《人民日报》汇总说我这篇文章是当周的第五大新闻。这篇文章发表出来之后，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中青报社 8 月 19 日早上发出文章，中午之后我不断接到要求采访之类的电话，当天下午我便接受了许多采访，第二天就产生了这样一个局面：在中国很有影响的《新京报》和《南方都市报》对我进行了“围剿”。《新京报》在 8 月 20 日发表了两篇批判我的文章，一篇是在它的社论版，一篇是在它的文化版，这个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就在一个报纸的同一期发表两篇同样腔调的、观点一致的文章，而且是针对同一个人进行批评的；《南方都市报》也对我进行了采访，但是他们是在社论版发了一篇对我进行羞辱的文章，标题为《有节操的批评是一门技术活》，说我的这篇文章没有节操，不懂技术活。此外，也有人在文章里说我是为权力说话，是代表着某种力量来打压青年的偶像，比如韩寒等。这完全是不顾起码事实的说法。

在这种局面之下，所有围攻我的人都只有一个论调，说我这篇文章是“文革”大批判。最为典型的是有人把我比喻成姚文元，认为我在《中青报》的这篇文章相当于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还在其文章中做了很细致的比较。但是这类人他们自说自话，毫不顾及逻辑地来抨击别人，我认为这是很可悲的，即他们自己前面说的话和后面要达到的目的是完全相反

的。他们认为我就是今天的姚文元，在用“文革”式的方式批评韩寒。学者谢勇对关于什么是“文革”文风做了四点界定：一是在主流媒体上发表文章；二是文章作者都是奉命写作；三是文章有政治企图，背后有政治目的；四是不容许讨论。譬如说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发表后是不容许讨论的，只能学习。如果用这四点来衡量我在《中青报》发表的文章，会发现我只有一点儿是符合的，即我的文章发表在了中国第三大报《中青报》上。那么我是奉命而作吗？不是。关于政治意图，我在这篇文章中已经明确说过调查韩寒事件给这段历史一个清白。最为关键的是“文革”作品不容许讨论，那么还有许多人在讨论我这篇文章，所以我与此类人在微博上进行了“斗法”。

这是一个前奏，坦率来说，我写这篇文章是我自己立意、自己投稿，然后获得编辑的认可，而且中间也进行了反复的修改，但是后来还是有个硬伤被对方给抓住了。我说韩寒有三点回应，其实我写了四点。但是整篇文章的每个字我都是反复斟酌的，这是我做批评的一个原则，就是一旦我发表出来的文字，每一个字我都要负责。所以我不会像那些人一样，说的话前后自相矛盾，这就是我跟大家描述的当下的文化生态。

关于韩寒，2012 年我在清华大学演讲时，当时在大礼堂有 1800 多人去听演讲，现场反应非常激烈。我负责任地讲，韩寒是一个假作家，他的水平先不讲，但他绝对是一个假作家，他 99% 的文字不是他自己写的，这是两年以来我对韩寒的所有研究认知的结果，而且这个结果我是会负法律责任的。为什么说他是一个假作家呢？关于韩寒，在百度百科上我们简要地搜索一下会知道，他 1982 年出生，读了两次高一，两次高一文化课都是七门全部不及格，但是他获得了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而且这篇 1000 字的获奖文章是在一小时之内完成的，请大家记住这一点；然后 1999 年 3 月开始创作《三重门》，20 万字不到一年的时间完成并且出版。《三重门》出版的时候韩寒不到 18 岁，其中引用了许多文章和著作，而他爸爸说他在 15 岁时是一个不爱读书的人，说他 15 岁时开始接触《少年文学》杂志。一个 15 岁时才开始接触《少年文学》杂志的人，17 岁就写出这样一本书来，运用这样大量的引用，是不可能的。我相信世界上有天才，但我不相信世界上有天知，看看世界上的那些天才作家，比如歌德，22 岁时写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那是天才之作，一举成名。但是在《少年维特之烦恼》里面，他只介绍了为数很少的几个文学作家。还有一点，韩寒是以叛逆形象著称的，一个叛逆的青年会像一个衰老的学究一样？这跟他的性格也是不吻合的。所以对韩寒的真假判断，我觉得应该多种因素结合起来判断，而不是简单地你喜欢或者不喜欢。看看这些书，不要说过去，我现在让韩寒把这些书的作者说出来，估计他能说出十本书就不错了。最为关键的是，一个写出这样一本书的人，他的语文、历史、英语全部不及格。是为了反叛教育制度吗？其实不是的。关于韩寒对教育的态度，来看看他是怎样辱骂教师的：他不是辱骂某个具体的教师，而是所有的教师。比如说到学生应该跟谁学？他认为应该跟狗学！而且在 1999 年《三重门》中对女性的描写，也充满了歧视。在 2006 年，在他骂文坛的时候说的那些话，完全充满了非常淫秽的东西。所以，我说韩寒是反智，什么是反智？在美国的维基百科上有一个综合性的介绍：说反智就是对知识、知识分子和追求知识的一种敌视和怀疑。说简单一点儿，就是认为教育、哲学、文学、艺术等等都是没有用的，而且蔑视它们，这就是反智。请大家记住这一点。

我认为韩寒的反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自我吹嘘他是不读书的，而且参与制造不读书的天才这个谎言。没有不读书的天才，李白是天才，但他少年时读书非常刻苦，“铁杵磨成针”这一典故就是来自于李白；再比如说庄子，庄子也是反智的，但是读完《庄子》之后你会发现，我们有什么资格可以反智呢？只有读完书才可以反智。庄子的反智按照现代中国的历史家、大学者余英时的说法，庄子的反智是超越性的反智，简单来说，就是反对书呆子、反迂腐、反对以书本来束缚和限制人生，并不是说让我们真的不要读书。而第二点韩寒的反智就是表现在他对教育的恶意嘲弄，并且否定教育对于青年成长的意义。在韩寒的造神运动当中，我们的学术权威、文学权威都像得了神的召唤一样，放弃了尝试和理性。所以我认为反对应试教育的弊端不是反智，我现在也经常批评我们的应试教育，中国现在为什么缺少真正伟大的创造者？缺少天才式的人才出现？还是我们的应试教育存在太大的问题。就我所接触到的文科学生来说，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应试教育对学生的创造力不是在培养，而是在压制。所以我并不为应试教育叫好，虽然我也得益于应试教育，没有高考我就不能站在这里，但我认为以个人的偏才、特长去抵制、扼杀个性的教育模式，更不是反智。我们要把这些澄清之后，才能理解我们为什么要批评韩寒。

当然，更重要的是今天的韩寒是一个公知韩寒，这个公知韩寒是人造的意见领袖。以下是《南方周末》把韩寒写成 2009 年的年度人物时给他的一个评价：“公民韩寒他首先尽到了一个合格市民的本分，他对自己生长的城市这一年发生的种种不平之事尖锐地批判，这是因为他爱这里，真把它当家园……率真而理性，不高调也不怯懦……韩寒的可爱可敬就在于他做自己最喜欢的事，说自己最想说的话。”我认为这段话和 2012 年的韩寒相比较，说的完全是反话，2012 年的韩寒既不率真，也不理性，既不高调，却是怯懦。

那么，韩寒今天为什么会有这样巨大的影响？有很多学者做过调查：从 2008 年到 2012 年期间，南方系的报刊对韩寒有 155 篇报道，平均每个月有三篇。所以韩寒是南方系打造的一个偶像，这是不容置疑的。因此，在 2012 年，方舟子等人出来揭露韩寒的时候，南方系联手围剿方舟子，而且最后写了一篇方舟子被鉴定为精神疾病的报道，今年他们又把我说成了文革余孽。网友麦田在 2012 年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人造韩寒——一场关于公民的闹剧》，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当时是一场“大地震”。韩寒对麦田回应了三篇文章，三篇文章都让人感到这是一个抓狂的人，即一棒子被人打中了，可以用丧心病狂来形容。为什么说他丧心病狂呢？当别人质疑你的时候，你怎么面对质疑？韩寒做的就是辱骂加威胁，这可以从他的回应当中看出。方舟子调侃了韩寒一下，韩寒马上调转枪口，对准方舟子，把方舟子的光头之类都拿来羞辱。看到这些的时候，我就认定韩寒是假的，因为以韩寒已经积累起来的人气、地位、影响力，假如他是真的，不管他多么生气，他都犯不着也不可能这么慌乱，而且这么糟糕地去回应麦田和方舟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韩寒自己做了两件抽自己耳光的事情，他在博客上和方舟子说不下去的时候，就起诉，并且起诉了两次，之后又去撤诉，理由是要修改起诉书；还有一件愚蠢的事情，他说作家没有办法自证清白，之后把所谓的手稿拍了照，自己坐在上面，很神气，很成功的样子，最后在 4 月 1 日出了本书《光明与磊落》。这本书出来以后，我完全不信他所谓的什么手稿了，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还有一点可以证明：韩寒的微博私信 100 多字，起承转合没有一句话是通顺的，如果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给父母留的

字条,也不会写成这样。而当时的韩寒已经 30 岁了,就是这样一个人,可以写成 20 万字、引用了这么多书、竟然不需要修改段落、只是对个别字进行修改的作品,根本不值得相信。我们也见过许多大师的手稿,虽有很多一稿而成的大师,但也是需要修改的。而一个七门功课不及格的人,写了 20 万字的长篇小说,引用如此多的书,竟然没有一个自然段需要修改,在这个前提下如果还有人相信他,那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做了这两件自抽耳光的事,从危机公关来说,韩寒应该如何面对?首先,假如我是韩寒,我绝对不去搭理他,无论他们怎么宣扬,宣扬什么,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第二,如果我真的需要搭理他们,只能尽可能地去陈述事实。所以从危机公关来说,韩寒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将自己置于死地。韩寒的垮掉是他自己把自己摔破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总结了几点:1. 对文革知识的不了解,使《三重门》这部作品中涉及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地方错误百出,并由此推出韩寒不是《三重门》的作者;2. 说话、做事出尔反尔;3. 在 2012 年时仍然不具备一个高中毕业生应该具备的文史知识,多次谈话都表现出常识性的错误,且语言表达能力极差,道德上就更差了。

我们在谈到韩寒的时候,总是把他想象成为两个很纯粹的角色,一个是“天才青春少年作家”,还有一个就是“公民意见领袖”。其实在 2012 年之前的多年,韩寒就已经是多种品牌的代言人,比如韩寒曾经在前几年中国的大规模反日行动中,在其微博中公开表示:“我是绝对不开日本车的。”但是事实上他不但开日本车,还为日本车代言。为什么在 2012 年时对韩寒的批评得不到应有的媒体空间呢?包括新浪网都对批评韩寒的作者进行打压,韩寒被保护,背后其实有两股力量:一个是南方媒体对他的保护;还有一个就是他代言的那些品牌对他的保护,所以有一个强大的力量不愿意让韩寒倒掉。那么,2014 年的韩寒是什么样子呢?他在 2012 年之后基本不再写时政性的博客了,所以自由意见,或者说公民公知韩寒在 2012 年之后不存在了。这就是现在的韩寒——“国民岳父”。把自己年幼的女儿作为盈利的手段,被南方系塑造起来的韩寒,不应该是一个商人式的韩寒,更不应该把自己一个未成年、没有起码社会认知力的女儿拿来作为商业炒作的符号,失去了起码的道德底线。1999 年的韩寒是“早熟”(有一种成年人的酸腐)的韩寒,《三重门》也是以所谓的叛逆为表象,实际上表现的是一个中年人的阴暗、酸腐心态的韩寒;2006 年的韩寒是一个混不吝的反叛者;到了 2010 年间,又变成了“公民韩寒”,作为公民社会的开创者,自由意见领袖的韩寒,关心国计民生的韩寒;但是到了 2012 年,他被揭露了造假之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新的韩寒,就是一个没有底线的商业炒作的韩寒,从他对他女儿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即过早地把女儿带到商业社会中来。

最后一点,韩寒在今天是一种“符号”。《中青报》的评论部主任在我的文章发表之后的几天在南方的《晶报》发了一篇文章,叫《谈韩寒是危险的》,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谈韩寒,今天都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不是被这方打,就是被那方骂。我之所以参与批评韩寒,主要的原因是跟我的性格有关系,如果说中国文坛是一个江湖的话,我觉得我在江湖上是一个侠客,而且是一个独行侠,我是有目标地来搜索信息,而不是以什么圈子来进行所谓的关注。韩寒是一个虚假的偶像,2012 年韩寒被质疑代笔之时,有些著名的企业家、教授和媒体人士对韩寒被质疑有几种表现,比较明显的就是带有哀婉情调的感情的,对韩寒表示同情。2012 年我写了一篇 12000 字的学术文章《韩寒神话与当代反智主义》,所以我今年的这篇文章一上来

就批评韩寒，一上来就给韩寒“扣帽子、打棍子”。那些挺韩寒的人，在对另外一些社会事件发言的时候，给人的感觉是追求真相、仗义执言的，甚至是无所畏惧的，为什么在韩寒这件事情上他们就简单地拒绝了、阻断了对一个真实追问的可能，而且剥夺了别人追求真实的权利，把追求真相的人给污名化，甚至给戴上“文革”的帽子？他们把我的文章比喻成姚文元《评海瑞罢官》式的文章，我在这里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篇臭名昭著的“文革大批判”样板文章我至今没有读过。说我的文章跟姚文元的一样，是先谈作品，再谈人，最后归结到历史，其实从我当时的构思来说，韩寒造假没有几个人在看，肯定要从电影引入，这是写作新闻的技巧。我们的媒体人、公知们为什么对这件事情不讲道理、不问是非呢？而且还颠倒黑白！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公共媒体缺少起码的是非、道义、底线，所以才会有那些肆无忌惮、不负责任发言的媒体人。到今天为止，不管是我在微博上的发言，还是博客上的发言、正式报刊上的发言，每一句话我都会负责任。而且对于我批评的对象，我没有需要检讨的，需要检讨的就是我曾经赞扬错的几个人，包括韩寒。

再来看韩寒，我觉得韩寒是猥琐的。比如他的《后会无期》中，有几个正常青春期的男性，看日全食的时候为什么会看得这么猥亵呢？而且其中的语言也是很拙劣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所以在我认真地看了韩寒的作品之后，认定韩寒确实是很糟糕的。即便他不是虚假的，也是很糟糕的，更何况他还是虚假的。我认为韩寒代表了当代文化的一种走向，就是文化消费时代的反智主义。反智主义在中外历史上都有出现，而且反智主义常常是被用作统治阶级的一种愚民手段来处理，反智主义在现代西方文化当中，特别是在二战以后，其直意就是反文化，或者说反传统。西方的反智主义（即二战后的反智主义）和韩寒式的当代中国文化的反智主义在表现形式上是有些相同的，就是嘲讽传统，贬损传统价值，把美和丑、雅和俗颠倒。但是西方当代的反智主义的积极意义是反对消费社会，或者说反对工业化以来的现代体制性社会，就是把人完全压制在一个制度性的社会里面，所以说它们的核心是反体制，并不是反文化；但是韩寒式的反智主义恰恰是在做两件事，一件就是延续了文革传统，说读书无用，还有一点就是不读书才有大用。那么为什么韩寒不倒？为什么有那么多高级知识分子来吹捧他呢？我认为有多种原因，最简单直接的原因就是他们之间有利益关联，南方系的人吹捧他，因为南方系不仅有媒体推一个公知来做代言人的因素，还有一些是我们现在未必能搞清楚的，但我认为是有复杂的利益关系的。还有一点原因，就是在消费时代有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一种消费意识形态、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或者就是消费主义。消费主义是由两种价值架构起来的，一个是利益架构，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使很多人特别是很多文化企业人士不愿意放弃韩寒；还有一个就是享乐主义，包括所谓的欣赏、喜欢，这种价值观导致的结果就是在揭露韩寒的时候，很多知名人士尤其是一些女性出来反对，但人数较之 2012 年的人数减少。

种种反应归结起来，我觉得在我们当代中国，消费文化最后形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假借自由和道义的一种偶像崇拜，而这种假借自由和道义的消费意识形态落实下来，就是韩寒现象。所以我讲的韩寒现象不等于韩寒个人，这个社会在我们的公共媒体、公共空间上面没有起码的是非，而且认真说话的正义声音不是很快会被淹没，就是被妖魔化。我们现在的消费意识把自由、反叛，还有所谓的正义作为虚假的偶像，这种虚假的偶像不是真正地把我们引向自由和民主，而是变成了巨大的资本利益的一个消费符号。韩寒这种虚假的符号

怎么都可以圈钱,怎么都可以有市场,这种消费有种畸形的心态。中国大陆现在把剥离是非、剥离真假、剥离善恶这种判断来作为纯消费,这样一种反社会底线价值的一种消费追求,变成了一种基本的消费意识形态。这种消费意识形态就导致最近几年以来不仅仅是韩寒现象、郭敬明现象,也产生了《分手大师》之类的可以说是垃圾的恶搞电影,电影情节没有技巧可讲。再比如韩寒、郭敬明的电影,我认为也是垃圾电影,这主要从电影技术来讲,比如《小时代》系列,就是一个个极尽奢华的镜头的连续,不管从中国电影史来看,还是从国际电影史来看,这样的片子作为学生作业都是不及格的。

为什么我这次要批韩寒呢?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这些没有底线的影评家,无耻地去吹捧韩寒,而且为了吹捧韩寒,也无耻地一定要在韩寒和郭敬明之间论个高下。韩寒的电影出来之后,基本是口径一致地在吹捧韩寒,说韩寒的电影票房和口碑都高于郭敬明。我认为作为一个有名的电影评论家,这么说很无耻。这样把韩寒和郭敬明作对比是不合适的,因为郭敬明的《小时代3》在去年已经火了一把,《小时代4》卖了4个亿,去年的4个亿要高于今年的6个亿,因为去年中国电影市场的荧幕不超过1.8万块,而今年有2.5万多块荧幕,由于对电影的刚性需求增加了,导致电影票也水涨船高。这样以票房作对比,我认为是很虚假的。因此,消费主义为了这种娱乐性或者说享乐主义、价值追求的虚假性,便形成了这种偶像制造、偶像营销的基本意识形态策略。这种策略导致了我们中国电影市场小丑当家、烂片走红的状态,导致了我国影片在海外没有票房,我们的电影在国际电影的大环境下属于关起门来“自愚自落”。

最后,我觉得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种在消费时代的虚假的文化自由,虚假的文化自由就是一种消费主义的偶像制造和消费,韩寒、郭敬明等等都是这样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如果在美国,韩寒、郭敬明等等可能会有一定的市场,但是凭他们本身的演绎和创作,不可能有这样大比例的影响;而中国是一个很畸形的市场,也是一个畸形的消费社会。所谓畸形,一方面是权力和市场间的关系没有割清,所以我们还要改革;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来说,缺少应有的文化准备和心理培养,我们对文化市场、文化产品的消费更大程度上是一种非理性的消费。所以,作为一个研究美学的学者来说,我认为对韩寒事件的追问是必要的。美学的审美心理是建立在对人生事件的真诚基础之上的,艺术的创造需要有虚构,但是虚构要建在诚意的基础之上,而且我们不能挂羊头卖狗肉,分明是一个中年男子的小说,却硬要加在一个少年的身上,这是不合适的。我认为这是一种欺诈,这种欺诈是违背美学原理的,当然也违背了社会的诚信原则,违背了商业的诚信原则。韩寒的形象之所以在今天有这样那样的商业价值,得益于从他开始出名以来的两度制造(一个可能包括他父亲在内的“少年作家”的制造;另一个是媒体对他的打造,比如南方系把他制造为一个虚假的公民领袖)。韩寒的商业价值是建立在当下的反智文化时代基础之上的韩寒的独特魅力,这样的魅力使他成为一个超值的娱乐消费形象。

所以,消费时代的意识形态冲突最后总结起来,就是基于一种利益主义和享乐主义,消费文化制造常常会以虚假的偶像制造为一种产业发展资源。我们应本着对于生命、对于世界、对于文化、对于文明的一种真诚热爱,去追求真实和美好。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录音整理:关聰)

晚明社会转型的历史思考

商 传

【作者简介】商传，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明史学会会长。本文根据商传先生 2013 年 12 月 15 日在吉林大学的演讲整理而成（北京 100732）。

非常荣幸能给大家做这个报告，因为我曾经也在吉林大学工作过，今天在这里我想和大家一起做一些交流，并谈谈我自己学晚明史的一点儿体会。

说起晚明的历史，我的老师谢国桢先生是我们国家研究晚明史的泰斗，写了很多关于晚明史的专著。和老师相比，我感到很惭愧，因为我考到社科院来跟老师读书的时候，我们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届研究生。读书的时候我并没有研究晚明史，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我认为我们要想读懂一代历史，必须首先懂它的典章制度，那么我就只能从明朝初年的东西开始，从典章制度做起。等到我做完了这些东西，我想应该开始做一点儿晚明研究，按照我老师的学问去做的时候，很不幸，我的老师故去了。这时我才感觉到很后悔，如果老师健在的时候，我就跟他一起学习晚明史，我一定要比今天方便得多。虽然机会错过了，但学问还是要做，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的老师带我去江南的苏州，他晚上听评弹，每次他听完回来，我都问他今天唱的是什么戏文？老师都跟我说三个字：不知道。因为他是河南人，听不懂。那么为什么还要去呢？因为他祖上是江苏人，从小就听他的祖母给他讲那些江南逸事，所以他对江南有一种情感。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个时代的时候，我才明白谢国桢先生为什么要研究晚明，因为这个时代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时代里距离我们今天最近的一个时代。如果穿越，那么我们一步就可以穿越到晚明去。而这个时代，又恰恰是我们今天很多人误读的时代，他们不知道晚明什么样子，他们曾经跟我一样，在懵懵懂懂里面就认为晚明不好，因为晚明最终灭亡了，专制、阉党、党争、农民起义、国家灭亡，这样的时代有什么可读的、有什么可好的呢？

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我们误读了晚明史。大家想想，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可以称之为“晚”的时代，有几个呢？从秦朝开始，除了晚唐、晚明、晚清，我加了个晚宋（一般都称之为南宋），除此之外没有了。为什么呢？“晚”是一种包含特殊定义的历史时段，有两个特点：1.“晚”比“末”长。秦、汉、晋、唐、宋等朝代都有“末”，但不都有“晚”；2. 明中叶以后，政治腐败，可是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却很繁荣。实际上所谓的“晚”这个时代一定是我们从表面上来看，它旧的体制腐败了，社会问题复杂化了，整个社会给人的感觉是在走下坡路，临近于它灭亡的下坡路，但是它的经济和文化相当的发达，如果我只从经济文化的角度来看，我们会觉得这个时代是很繁荣的。这样的时段在历史上往往就被定义为“晚”。它距离“末”还有一段时间距离，从现象上来看，它还带有一些有生命力的东西，这个时段叫作“晚”。这是在我们中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点，这个时段往往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社会转型的时

期,这就是“晚”的最主要的特点。

那既然是这样,就很有意思了。晚唐有安史之乱,晚清有鸦片战争,那么,晚明的历史坐标在哪儿呢?一般来说,大家比较公认的,从万历朝开始,进入了晚明。这个概念是谢国桢先生首先认定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写了《晚明史籍考》,很有影响,这个时候我们中国有个著名的文化人柳亚子,他曾说过,谢先生的这部书“是打开晚明史的一把钥匙,但是这部书上启万历、下至明朝(桂王政权)灭亡,也不都在晚明的时段范围之内”。听完他的一席话,我们感到很困惑,他说“不都在晚明的时段范围之内”,那么他所说的晚明是什么时段呢?大家知道,明朝到后期,我们既有晚明之说,也有南明之说,我认为,晚明还是应该从万历朝开始,到明朝灭亡。至于明朝的灭亡时段很难说,如果说我们说它在崇祯 17 年灭亡,这事比较简单,李自成推翻了明朝,如果往后延一年,延到洪光的灭亡,那么明朝就是被清朝推翻的。所以,这一年可不简单,它造成了两个不同的埋葬明朝的事例。

所以,晚明这段历史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东西,只不过我们过去误读了它。我们都说明的名声不好,为什么呢?我总结了五条原因:1. 对晚明发生的社会转型变化的实质不了解。我们只讲晚明的历史,没有讲它社会发生的变迁,这个问题是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就涉及的,毛泽东在他的一本小册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里有这样一段话: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段话影响力很大,其实是个伪命题,历史是不可以假设的。毛泽东假设了这么一种历史: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中国历史有一个那样的发展,我们只看到了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它影响了我们,我们也发展到了一个在性质上“半封建”的社会。当然,这个“半封建”所付出的代价是主权的丧失,叫“半殖民地”。毛泽东的这段话,虽然我说他是在假设历史,可是却起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让我们史学界突然之间感觉到如果没有外国的影响,我们中国会怎么发展呢?我们过去并没有关注过,现在很值得关注,这就是对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2. 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主要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就是雇佣劳动,这样一种生产关系的萌芽在我们中国很早就出现了,而到了晚明时代,就非常普遍了。直接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社会发生了转型,这便是毛泽东这段话对我们史学研究最大的贡献。我们过去讲资本主义萌芽而今天不讲,因为资本主义萌芽是欧洲中心论,我们拿着欧洲中心论来做坐标,往上面贴我们中国的材料,像它的就是资本主义萌芽,不像的就丢开,这是不好的。因此,今天我们不叫资本主义萌芽,我们叫作社会转型,二者不完全是一回事。我们只讲我们自身的社会转型,如果我们看到了这一点,那么这个历史时段的价值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3. 明朝灭亡了,灭亡的朝代一定不好吗?明朝的遗民自己找灭亡的原因,他们在反思的时候很痛苦,因为他们没有想到明朝会灭亡。明朝是一个很强大的朝代,一直到它灭亡之前明朝人都觉得自己强大得不得了,突然间就灭亡了,所以明朝的遗民们用四个字来形容明朝的灭亡,是“天崩地坼”,一下子就不知所措了,国家灭亡了,没有一点儿的心理准备。等灭亡了以后,大家在找灭亡的原因的时候说什么的都有,但是如果大家去好好地读一读关于这个时段的著作,或者读一读当时的一些文集,我们就会发现明朝的遗民对于明朝灭亡的反思,找的理由都不够准确,都是别人的原因。比如《柳如是